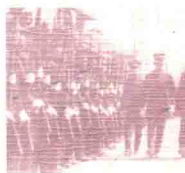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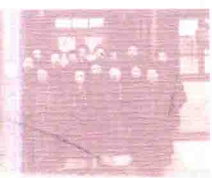


清末社会变革剪影

Qingmo
Shehui Biange Jiaoying

范福潮◎著



人民出版社

范福潮◎著

清末社会变革剪影

Qingmo

Shehui Biange Jianying



人民出版社

统 筹：图典分社

策 划：侯俊智

责任编辑：郭 娜 陈建萍 侯俊智

责任印制：孙亚澎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清末社会变革剪影 / 范福潮 著. 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6.12
ISBN 978-7-01-016478-6

I. ①清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社会变革—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
IV. ① E229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166819 号

清末社会变革剪影

QINGMO SHEHUI BIANGE JIANYING

范福潮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）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15.125

字数：31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6478-6 定价：36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谨以此书

献给投身于清末改革事业的仁人志士

序

2014年春，应刘小磊先生之约，为《南方周末》撰写“清末改革史话”专栏，旨在考订史籍，评析人物，梳理清末改革史事，再现庚子至辛亥年间社会变革画卷，心志不可谓不大。无奈夏秋之后，公私事繁，心力不济，渐感难负重任，虽勉力为之，亦未完篇，顿觉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，果非虚言。

从“新政”到“预备立宪”，是清末改革成就最大的十二年，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亘古未有的改革运动。这场改革从筹备到推行，争议不断，举步维艰，从朝廷到地方，各派政治人物悉数卷入，每前进一步，都充满了猜忌、斗争和妥协。与近代史上其他国家的改革相比，尤其是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，它并不完美，有不足，也有成果，有保守之处，也有激进之处，蹒跚十年，功亏一篑，终因武昌起义而夭折。但也仅是夭折而已，并不算失败，它对国人的思想、文化乃至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，并不因清帝退位而消失，一直持续了二三十年。

仔细研究这段历史，我发现，这是在错误的时机、罔顾国情

进行的一场改革大跃进。何以故？

以时机论，如果在“同治中兴”时期“预备立宪”，那时，大乱方平，人心思定，慈禧太后年轻气盛，稳操政柄，内有奕訢、荣祥等贤相辅佐，外有曾、李等中兴名臣配合，枢臣督抚，人才济济，内以洋务运动发展工商、修建铁路，以欧美留学生改革教育、普及学校，以湘勇淮兵改练新军、扩充海军，主动出击控制台湾、朝鲜，外与英美结盟北抗俄国，东压日本，摒挡俄日势力于满蒙朝鲜之外，积数十年之功，稳步推进君主立宪，庶几有成功的可能。而三十年后，历经甲午战败，庚子暴乱，内政外交，大势去矣：内则贤臣名相，相继而亡，朝臣督抚，庸懦无为，加之帝后之间、满汉之间、朝廷与督抚之间、士绅与官员之间，矛盾重重，争斗激烈，又有革命党人连年起事相逼，骚乱暴动，此伏彼起，已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政治条件；外则台湾、朝鲜已失，国门洞开，日俄攘夺满蒙新疆，英法虎视云桂西藏，德占山东，日窥福建，东南西北，频频告急，瓜分蚕食，势不可挡，清朝已不复有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。处此内外交困之时，维稳尚且不易，清廷竟想用九年时间推行全方位、大纵深的政治体制改革，扶危定倾，巩固皇权，犹如奄奄病体，骤用猛药，只能速死。

以国情而论，财政基础与国民程度都难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改革。一则，国家连遭甲午、庚子战乱，商民损失不计，光是军费和对外赔款即达白银七亿多两，加上四亿多两外债的利息，每年增支达三千多万两，战前已经年年赤字的财政，逐年恶化，新

政缺乏充裕的财政支持，练新军、办学堂、改官制、办警察、地方自治乃至人口调查，无一事不靠地方官吏大肆罗掘，把改革成本转嫁至底层民众，而在灾难连年、民不聊生之际，加捐增税，无异于逼民造反。二则，多数省份不通铁路、航运，多数州县没有电报、报纸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国民不识字，交通阻隔，信息不灵，省城之外，闭塞保守，别说农民，就是州县官吏和乡绅，也多半不知“新政”“立宪”为何物，改革的受益者多是归国留学生和士绅中的上层精英，在州县以下层级，缺少乡绅的密切配合，更无民众的积极参与，是故，在兴办学堂和人口调查时遭到各地乡民的抵制，多省爆发拆毁学校，殴打劝学员和户口调查员的骚乱。

改革是基于长治久安之策对国家发展战略所做的重大调整，不仅是对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司法、经济等制度的修补与更新，亦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，揆情而论，参与“预备立宪”的各方，都有谋略失当和行事过激之处。

清廷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者，新政初期做了许多扎实而有益的事，虽被时论讥为保守，但步伐稳健，颇有章法。日俄战后，面对举国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，顺势而为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，继而宣示预备立宪，也的确是顺势应民之举。面临如此重大的决策，执政者本应通盘考量，详审次第，优化路径，妥订日程，计算改革成本，评估政治风险，筹划遇到阻力时的应对之策，然后由易到难，渐次推进。但慈禧太后已过七十，年迈体衰，久居深宫，朝夕与佞宦为伴，既无宪政知识，又无雄图大

略，缺乏决策者应有的定力和远见，显然无力对预备立宪作长远的规划，果然，立宪诏书颁布后，随即被权臣与舆论裹挟，以致筹备事宜，次第紊乱，举措乖张，或朝令夕改，操切行事，或敷衍弥缝，疲于应付。在新式学校尚未普及、新的官员选拔制度尚未建立之前，仓促废除科举，一夜之间断送上百万读书人的仕途和生计，致使学子含怨，士绅离德，维持政权稳定的官绅共治的社会基础迅速瓦解，朝廷既已规划十年三科分期递减，本可照章施行，未过四年，权臣一奏，即刻废除，可谓操之过急。1905年1月27日，清廷接受张謇“徐州宜设行省”的建议和御史周树模“裁漕运总督”的奏请，宣布设立江淮省，改漕运总督为江淮巡抚，即以原驻清江为行省，江宁布政使所属之江、淮、扬、徐四府及通海两直隶州全归管理，仍由两江总督兼辖；未及三月，因署理两江总督周馥等人的反对，即于4月21日裁撤江淮省，可谓朝令夕改。庚子之后，汉族反满情绪日趋强烈，督抚坐大已成定势，朝廷宣示君主立宪，首先要体现公心，顺从民意，诏令剪发易服，取消满人特权，颁布皇室典范，编制官廷预算，重用汉族大臣，融合满汉关系，再从城镇乡地方自治起步，逐步设立州县地方议会和省谘议局，通过选举议员和议会活动，普及宪政知识，提高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能力，然后开设资政院以充临时国会，俟时机成熟，开国会制定宪法，然后再改官制，可是，清廷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一宣示预备立宪，即把难度和阻力最大的官制改革作为首选，可谓次第紊乱。既提出官制改革，就该按君主立宪国的通例，限制君主和皇室权力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

三权分立，就该裁撤军机处和冗杂官署，皇室宗亲退出政府，体现君主向内阁分权、中央向地方分权、行政向司法分权、满人向汉人分权的原则，建立以汉人为总理大臣及主要政务大臣的责任内阁，昭大信于天下，清廷不为巩固君权而立宪，但清廷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，军机处不裁，却急不可待地将军权、财权和政府要害部门收归皇族和满人，大力削弱督抚权力，令人不得不怀疑清廷立宪的动机，此举一败，政局紊乱，引发一连串恶果，可谓操切行事。在筹备立宪的关键时刻，帝后同时驾崩，慈禧太后临终前未能选定一位英明干练的摄政王，给宣统一朝贻害不浅；载沣昏庸无能，气量狭小，值此危难关头，正是用人之际，袁世凯、张之洞已成支撑危局仅存的两根支柱，本该委以重任，以安汉人之心，稳住朝局，稳步推进立宪，他却将一个罢官驱逐，一个冷落闲置，重用一帮少年亲贵，恣意妄为，在谏议局、资政院已经开会，国会请愿运动席卷全国之际，却推出“皇族内阁”，怨声载道，举国声讨，如此倒行逆施，可谓愚蠢之极。既与汉人争权，又强制推行铁路国有，与商民争利，川乱已起，不知息事宁人，敷衍弥缝，疲于应付，定策用人，一再失误，种种举措，无异于火上浇油，本已坐在干柴堆上，自己倒成了纵火者。预备立宪以来，清廷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的自私和暴戾，严重伤害了汉族官僚和士绅的民族自尊心，最终把原本是君主立宪的支持者推到了敌对阵营。

作为君主立宪的支持者，立宪派的策略起初还算稳妥，梁启超、杨度与同盟会就立宪与革命问题论战时，指出政体改革不能

脱离国情，主张循序渐进，张謇、汤化龙等人对此也有共识。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，尤其受革命党连年起事的影响，立宪派也愈发变得激进起来。谘议局和资政院开会后，立宪派有了一个合法的活动舞台，下可与督抚分享权力，上可与朝臣参议国政，已成很有影响力的政治集团，但他们并不满足到手的权利，想要得到的更多，期盼即开国会，主导制定宪法，限制皇权，监督政府，夺取更多的政治权力，《清单》规划九年开国会，与他们的政治诉求相差甚远，令其大失所望，遂联络各省谘议局代表进京请愿，提出“定期三年，召集国会”的主张，并在京城和外省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请愿活动。请愿失败后，立宪派认定清廷既无立宪诚意，亦无合作可能，便与之决裂，从此，他们在谘议局和资政院年会上，处处反对，事事杯葛，不惜鼓动风潮，胁迫朝廷就范。宣统年间，立宪派变得如此激进，究其原委，是在与革命党争时间（同样，革命党也在与立宪派争时间），因为革命一旦成功，他们将会被排斥在新政权之外。

在清末的政治格局中，督抚本是最有实力的官僚集团，与朝廷是皮毛相附的关系，按说应该支持改革，但当清廷欲以改革官制、财政、军制之名“削藩”，巩固中央集权时，激怒了他们。宣统二年十月，各省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，十八省督抚联衔入奏，要求立即组织内阁，定期明年开设国会，值此危机四伏之秋，他们却与立宪派联手发难，致使政局更加恶化。其后，他们或公开抵制，或阳奉阴违，或不作为，对属地和身边革命党人的活动视若无睹，对民变和骚乱任其蔓延，严重瓦解了清

朝的统治根基。

至于革命党人，史家从不把他们视为清末改革的参与者，其实，他们以另一种身份、另一种方式推动着改革进程。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作《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叙》，破题即曰：“自永历建元，穷于辛丑……中国之亡，既二百四十二年矣。”革命党人视明亡之日为亡国之日，视满人为侵略者，视清军为占领军，视汉族官僚为汉奸，概不承认满清政权的合法性。1903年7月6日，章氏在狱中答《新闻报》记者采访时说：“逆胡羶虏，非我族类，不能变法当革，能变法亦当革；不能救民当革，能救民亦当革。吾之序《革命军》，以为革命、光复，名实大异。从俗言之，则曰革命；从吾辈之主义言之，则曰光复。”后来章氏在《民报》第八号发表《革命的道德》又作说明：“吾所谓革命者，非革命也，曰光复也，光复中国之种族也，光复中国之州郡也，光复中国之政权也，以此光复之实，而被以革命之名。”1905年同盟会成立，即提出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的纲领，章氏在《民报》第十三号《官制索隐》一文中解释道：“吾侪所志，在光复中国而已。光复者，义所任，情所迫也。光复以后，复设共和政府，则不得已而为之也，非义所任，情所迫也。”由此可见，革命党人历来以推翻满清政权为天职，清廷变不变法、立不立宪，都不能阻挡其光复大业。同盟会成立不久，清廷即废除科举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；1906年，当《新民丛报》与《民报》掀起立宪与革命大论战之际，清廷即宣示预备立宪；革命势力的壮大给清廷以极大的政治压力，迫使其加快改革步伐。

改革与革命，看似冰炭不容，实则相反相成。改革，是统治者操控的和平、渐进的社会革命；革命，是反对派操控的暴力、激进的社会改革——此即嘉纳治五郎“和平的进步主义”与“骚动的进步主义”之谓也。明治维新，是“和平的进步主义”；辛亥革命，是“骚动的进步主义”。但二者的结果却截然不同：日本经过三十多年循序渐进的改革，建立起了适合国情的宪政体制，教育普及，工商发达，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年俱增，相继战胜中、俄，成为亚洲第一个与英、法、德、美平起平坐的现代化强国；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多年，政局动荡，民生艰难，国土沦丧，战祸连年，无论北京政府，还是南京政府，都未建立起宪政体制，就连清廷九年预备立宪《清单》规划的许多事项也未完成。为何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，清末预备立宪却遭夭折？其原因之复杂，牵连之深广，三言两语难以道明，足以写出一本专著，但有一点教训令我刻骨铭心：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，当政者须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，及早制定周密而长远的规划，在政局可控、财政充裕、社会安定、民心尚稳之时，当机立断，下定决心，先易后难，渐次推进，经几代人之努力，积数十年之功业，庶可实现国家之富强，社会之进步，若盛世苟安，得过且过，到了财政窘困、社会动荡、民心丧失之际，才把改革当作救亡之药，必败无疑。

小文二十八篇，多选自《南方周末》之“清末改革史话”“辛亥逸史”专栏，或谈人物，或议事件，笔随兴至，漫无统系，于清末改革，纵不能观诸全豹，亦可略见一斑，殷鉴不远，或可启

迪后人。清末十年，变化巨大，事件芜杂，人物众多，篇幅所限，实难求全，来年有暇，或作续编。

“清末改革史话”刊出后，人民出版社政治二部主任侯俊智先生来信，愿将专栏文章结集出版，诚意殷殷，遂定稿约。郭娜、陈建萍女士为编此书，悉心筹划，忙碌经年。三位编辑，鼎力相助，因缘具足，得以成书，在此谨致谢忱。

范福潮

2016年4月28日

目 录

序 /001

东南互保与庚子变法 /001

帝、后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/003 义和团的兴起 /005
朝廷向各国宣战 /008 从拒不奉诏到东南互保 /010
从中国议会到自立军起义 /014 从下诏罪己到下诏变法 /015

国家柱石刘坤一 /019

保障东南，匡扶大局 /022 抵抗俄约，维护主权 /024
办理交涉，悉协机宜 /027 江鄂会奏，新政奠基 /029

清末新政的设计师张之洞 /033

从清流健将到洋务先锋 /035 戊戌变法与《劝学篇》 /039
从《劝学篇》到“变法三折” /043

改造科举制：清末新政的第一步 /047

国有病，官知否？ /049 采“各国学校之法”，设文武学堂 /052

酌改文科，停罢武科 /054 速成学堂与奖励游学 /057
中日对比，立见差距 /058

新政纲领：“江鄂会奏变法”第二折评析 /063

病症与药方 /065 宫廷职官，虚靡华奢 /067
反腐倡廉，整顿吏治 /069 整理财政，平衡收支 /074

福泽谕吉的预言 /079

鸦片战争前后的日本国情 /081 攘夷与开国 /084
福泽谕吉与张之洞 /087
两本《劝学篇》：互相冲突的变法思想 /089

袁世凯练兵 /095

出身行伍，久经战阵 /097 小站练兵，新建陆军 /099
培养军官，招揽人才 /103 武卫右军，拱卫江南 /104
赞襄新政，缔造新军 /106

教育大跃进：从直隶学制到中央学制 /109

从漫无系统到三级学制 /111 从“直隶学制”到“壬寅学制” /114
从“壬寅学制”到“癸卯学制” /117

蔡元培：从翰林学士到革命志士 /123

都无做官意，唯有读书声 /125 告别仕途，教育救国 /128
从中国教育会到南洋公学风潮 /130 从暗杀团到光复会 /132

吴、章笔战与《苏报》案 /137

三个“疯子” /139 《苏报》案 /142
吴、章笔战始末 /147 吴敬恒笔下的《苏报》案 /151

《东方杂志》笔下的日俄战争 /159

日俄战事纪要 /161 日俄战争图画 /163

新书介绍 /165 亲日仇俄 /167

明耻自强 /169 立宪救国 /172

废除科举制：秀才的末路与新生 /175

一位山西举人的科举之路 /177 秀才的生计 /181

官员的厚禄 /185 入仕的竞争 /189

秀才的新生 /194 秀才的转型 /198

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/201

早期的日本留学生 /205

首批留日学生：唐宝锷与戢翼翬 /207

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：陈其采与吴禄贞 /212

自费留学生：张继与曹汝霖 /221

杨度与黄兴：留日学生的典型代表 /231

乡绅杨度：从举人到洋学生 /233

秀才黄兴，从两湖书院到弘文学院 /236

做官与革命，分道扬镳的留学生 /239

赴日留学潮的成因 /245

思想因素：从对日本有好感到以日为师 /247

赴日留学的利益动机和经济原因 /252

清政府积极支持出国留学，对归国留学生

制定了优惠的奖励政策 /255

留日学生受到政府的提拔和重用 /260

日本政府和学界欢迎中国学生前往留学，提供许多便利条件 /264

嘉纳治五郎的教育观 /271

普通教育的宗旨：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 /273

对振兴中国教育提出的建议 /274

理性、和平、渐进的改革思想 /276

“和平的进步主义”与“骚动的进步主义” /278

种族观与学术观 /281

教育之要旨，在养成国民之公德 /285

梁启超与清末预备立宪运动 /289

康、梁分道扬镳 /291

梁启超美洲之行 /292

代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起草考察报告 /293

革命形势逼人，清廷宣布立宪 /294

立宪派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 /295

梁启超与革命党的论战 /296

梁启超的预言 /298

革命党人占了上风 /301

杨度的宪政理论与国会请愿运动 /305

君主立宪理论的集大成者：《金铁主义说》 /307

政治革命，以改造责任政府为其唯一之目的 /310

以革命改换君主甚难，以国会改换政府甚易 /313

国会是改造责任政府的唯一方法 /315

草拟《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》 /318

奋力疾呼，发动国会请愿运动 /322

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 /326